

# 清代旅蒙商述略

秋原

# 清代旅蒙商述略

秋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旅蒙商述略 / 秋原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33-1788-7

I. ①清… II. ①秋… III. ①边境贸易—商业史—史料—  
中国、蒙古 IV. ①F7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061号

## 清代旅蒙商述略

秋原 著

策划编辑: 张立宪

责任编辑: 汪欣

责任印制: 韦舰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经销电话: 010-80897213

官方网站: [www.duku.cn](http://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70mm × 1092mm 1/32

印张: 15.5

版次: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788-7

定价: 32.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录

- |     |                               |     |
|-----|-------------------------------|-----|
| 第一章 | 赢得腰缠十万贯<br>通利异疆不相见            | 1   |
| 第二章 | 天王有道边城静<br>上相先谋马市开            | 14  |
| 第三章 | 荒城有路烽烟息<br>暖风吹柳换新衣            | 35  |
| 附   | 清朝内务府“官商”                     | 50  |
| 第四章 | 塞外降王三十郡<br>来朝尽隶霍将军            | 61  |
| 第五章 | 穹庐已绝单于域<br>牧地犹称土默川            | 76  |
| 第六章 | 瀚海路难人去少<br>阴山雪重雁飞稀            | 94  |
| 附   | 清准战争中清军给养保障体系<br>与康熙末年“屯田失察案” | 117 |

第七章	到处人皆著战袍 麾旗风紧马蹄劳	127
第八章	圣朝治化无中外 十万貔貅尚控弦	149
第九章	商人几点思乡泪 洒向刀头尽成血	170
第十章	利欲驱人万火牛 江湖浪迹一沙鸥	192
第十一章	还是幽燕游侠气 爱歌乐府少年行	206
第十二章	当年逐利辞乡县 天山翘首程如线	224
附	行国之城	240
第十三章	威加塞外寒来早 恩入河源冻合迟	291

第十四章	一朝一统四万里 九千九百五十年	321
第十五章	地涂肝胆斜阳惨 风飘灵魂夜月清	348
第十六章	孤蓬夜雨天涯泪 老骥秋风塞外思	397
第十七章	我来塞外按边陲 曾挥此马看君骑	420
第十八章	乡国近来音信断 至今犹自著寒衣	439
附	南茶北马	449
	后记	482

## 第一章

# 赢得腰缠十万贯 通利异疆不相见

后金天聪十年（大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拂晓，皇太极在八旗王公贝勒和满、蒙、汉三族臣僚的扈从之下，出沈阳德胜门，在城南天坛肇祀祭天。赞礼官以满、汉语朗声高诵祝文表章，他率文武百官向神位行三跪九叩礼，以这套繁琐的祭祀礼节，宣告自己从后金国汗王升格为大清皇帝，改元崇德。

既然已经升格为帝国，之前后金汗国那套带有部落血亲色彩的政治制度和君臣之道就要一概禁绝。次日，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颁布大清朝的各项规章典制，其中包括皇帝的大驾卤簿与诸旗主贝勒的仪仗行辕、文武官员的朝服纓帽。其中规定，皇帝的卤簿要有“玉玺四方、黄伞五把、团伞二把、大纛十杆、小旗十杆、刀三对、戟三对、立瓜一对、卧瓜一对……”；八旗和硕亲王的仪仗要有“红伞盖二把、大纛二杆、小旗十杆、立瓜一对、骨朵一对、吾仗二对……”

从当月二十三日开始，皇太极又陆续给这些亲贵们加官晋爵。跟以前的封赏不太一样的，这次作为赏赐礼物的并非金银和良马鞍鞞，而是改为在关外非常紧俏的蟒缎、倭缎等高级丝织面料。皇太极出手还颇为大方，仅科尔沁、扎鲁特等十六部四十九位蒙古王公得到的绸缎就有三百零五匹，其中有二十三匹倭缎和二十九匹象征身份的蟒缎。五月初，参加完登基典礼的蒙古王公陆续返回各自的驻牧地，在为他们饯行时，皇太极再次以缎匹大肆相赠，以示恩宠。

清朝首位皇帝的登基大典，不仅让沈阳城进入持续两个月的政治狂欢，还为这些满蒙亲贵和满汉臣僚提供了一次难得的物质享受。

据对《满文老档》和《清太宗实录》等史料的考证，在崇德元年这次登基大典前后，清廷用于封赏、裁制卤簿仪仗与赶制后妃臣工朝服所用的各种绸缎面料，总计接近三千匹。和历朝历代的开国情势一样，满人建立的清朝在肇基之时，也强调忌奢靡尚节俭，登基庆典只花费三千匹绸缎，是一个挺寒酸的事，对位于南边的大明朝或许算不上多大的经济负担，但对尚偏隅关外的清朝来说，不仅是一笔巨额财政开销，还曾经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稀罕之物。

满族的前身是明朝东北的女真，其自身社会文化中没有清晰的农耕生产意识，而是以狩猎和采集作为主要生产方式，长期从事在长白山地域的商业化采捕，获取人参、貂皮、鹿茸等特产，通过辽东马市，与明朝的官商进行交易来维持社会运行。从明朝中后期开始，中医出现了一些过分强调人参滋补效用的理论，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毫无药理可考的



传闻，给这种药用植物赋予过于滥浮的神秘色彩。晚明隆庆、万历朝改革后促成的经济繁荣，又让上流社会逐渐养成追求奢靡生活的习气，达官贵人以穿戴貂皮狐皮等高级毛裘为耀，形成攀比之风。这两类物资恰好是建州、海西女真所处长白山地区的特产，于是，女真部落形成很有针对性的商业化生产模式——每年四月进山捕貂采参，约在十月后，将半年的收获分批贩运到辽东马市向明朝官方和汉族商人出售，换取粮布盐糖茶等生活必需品。其社会观念中没有中原汉族“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概念，成年男性从事采参捕貂才被认为是受人推崇的正途，种地是女人和家里的阿哈（即奴隶）才会做的贱业。依靠明朝这个根本填不满的南方超级市场，貂参贸易给女真部落带来巨额财富收益，成为这个只有几十万人小民族的经济支柱，但同时也形成了经济结构过分单一的弊端。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明朝以关闭马市作为经济制裁，万历皇帝还敕谕属国朝鲜，不得趁机在鸭绿江私开边市与女真进行贸易。后金虽然占据了全辽，粮食棉布这些基本物资却无法自给，要靠在清扫战场时扒明军死尸的衣服来应付。努尔哈赤又试图以八旗制度来统治辽东汉民，用落后的庄园农奴制取代佃农制，残酷镇压汉民反抗，使辽东地区陷入一场罕见的人祸。到努尔哈赤晚年，后金统治下的辽东米价飙升至八两（银子）一斗，棉布九两一匹，蟒缎开出二百两还有价无市……

皇太极在1626年继承汗位后，开始推行一些缓和民族矛盾、促进生产的对策，又发动东征，凭武力强迫朝鲜开市

献纳。通过这些手段，到天聪朝后期，后金已经勉强解决了口粮问题，也可以生产低档的土蓝布，三顺王投奔带来的红衣炮让八旗掌握了和明军平起平坐的火器装备技术，这个国家算是走上了运行正轨。但是直到清军入关，清朝始终没有掌握绸缎织造技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天聪六年（1632年）开始，皇太极用绸缎作为犒赏属下的赐品，次数和数额还在逐渐递增。在崇德元年登基大典之后，绸缎干脆就与银两、貂皮、人参并列，成为清朝和蒙古进行贸易的四类主要硬通货。

皇太极手里的这么多绸缎，是从何而来的？

距这次登基典礼一个半月，清军以阿济格为统帅，再次发动入塞侵明战争。自1629年的己巳之变开始，清军通常都是取道靠近辽西走廊的喀喇沁左翼蒙古牧地，从位于北京东北方向、河北迁西境内的喜峰口突破长城，侵入华北平原。不过这次有些特殊：清军离开沈阳，沿辽西大道一路向西，到达今天内蒙古赤峰转为折向西南，在河北赤城县的独石口突破长城，侵入北京西北的延庆、昌平；清军一部攻入明十三陵，焚毁安葬明熹宗的德陵，作为对崇祯帝此前掘毁房山金陵的报复行动，随后清军主力进抵居庸关，截断京师和西北重镇宣化之间的联系。就在他们身后，已经投靠清朝的土默特蒙古右翼札萨克台吉俄木布楚虎尔，引领着数名八旗买卖人也从沈阳出发，紧随大军到宣化府辖下的张家口做生意，用银两和貂皮人参换回中原出产的绸缎。到崇德三年，利用清军的又一次入塞，八旗买卖人斋汉布携带两万四千四百三十五两银子和一百二十二张貂

皮，从张家口换回四千三百零八匹绸缎和棉布、茶叶、笔墨纸张等大宗杂货。

兵祸乍起，老百姓躲还唯恐不及，敢趁战乱之机做生意发财的，绝不是等闲之辈。这些趁机和入塞清军做买卖的生意人，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商帮集团——晋商。

谈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商贾之道和商人集团，晋商都是绕不开的重头戏。

晋商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非常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晋国就已经有“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了，不过我们今天一说到晋商，在不作特别说明的前提下，都是特指明清两朝，本书说的主要也是清朝的晋商。这是因为，明清两朝恰好是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下，商业模式和商业体系达到最成熟完备的时代，也是晋商从事经营活动最广泛和获取商业成就最辉煌的时代。尤其是到了清朝，给天下商帮排名，晋商若是自甘次席，就没人敢说自己第一。

笔者简单总结了晋商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有关联的特征——

一、晋商的这个“晋”字挺扎眼，突出了地域性，说明是着重强调籍贯作为划定标准的，而文化遗产、血缘纽带等属性被淡化了。中国人一贯重视强调宗族观念，商人也有形成家族式企业的传统，但是到明清两朝，晋商特别排斥宗族观念，有意识地避免商号成为家族生意。在清朝，也有一门父系祖孙传承的家族式晋商，但很多是以“富不过三代”作为结局的；反观几家最具代表性的百年老字号和晚清兴起的票号，全是采取外聘职业经理人的经营模式。过去常用“伙

计”来吆喝商店里的男性店员，这个词就源自清代山西商号内的人事安排。当时很有影响力的几家山西商号规定，东家不得参与日常经营活动，甚至无权干预商号的重大经营决策，一切运转，皆由外聘职业经理人带领大小伙计来完成。

二、明清两朝，商人阶层对社会各阶层具有最全面的影响，上层建筑有他们参与的重大政治事件，底层基础也有他们游走穿行的身影。许多牵扯到重大历史事件的著名人物，都和晋商有各种联系。比如在明清战争中颇有争议性的毛文龙，就是晋商出身。毛生于浙江杭州府钱塘县，祖籍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祖上原本是依靠盐引开中制营生的边商。弘治五年（1492年），明朝户部对盐政施行变法，由开中纳粮改为直接折色纳银，国策的变化迫使一些晋商迁居到江南扬州和苏杭一带，专门经营两淮盐业。平阳毛氏家族中的毛文龙这一支就属此例。

三、按照今天对晋商研究的普遍看法，明朝初年，为供应北方边境重镇军政开支而施行的开中制，是促使晋商兴起的商机。换句话说，依靠开中制发达起来的晋商，依然从事传统的官盐特许经营。他们本质上还是盐商，经营类型比较单一，直到明朝晚期才出现变化。但是到了清朝，从清军入关之始，晋商的经营就变得丰富起来，到晚清还出现了钱庄票号、镖局、印房等新业务。这既和清朝中期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关，也和晋商集团与满洲八旗集团实现政商勾连有关，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清朝能够直接统治的领土要比明朝大得多，对一些边疆地区的强力控制，给商人提供了更多发财的机会。晋商通过贸易，又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抽血，再

以股份红利、捐税等形式，把一部分养分输送给居于上层建筑的统治者。满汉官僚和山西商人形成这种政治、经济紧密互补的信用凭证，就是在一些清宫戏里时常听到的事物——龙票。

四、从明初的开中制开始，晋商行走大江南北倒买倒卖，必须减少货物损耗，节省运输成本，在保证前两点的同时，还要尽量缩减行程和周期，常年从事长途贩运，让他们成为经验最丰富的物流商。十七世纪晚期，漠西蒙古准噶尔势力兴起，与清朝展开持久战，到康熙末年，双方的战线已经西移至西康、青海、新疆哈密和北疆阿尔泰山一线。对于清军而言，战线延长且远离中原，后勤运输压力陡增，为保证军需物资供应，康熙和雍正皇帝采取比较务实的姿态，允许商人从事随军贸易，随后干脆以招商承办的方式，把包括粮草补运在内的后勤保障工作逐项承包给晋商。后者也的确没有让清朝皇帝失望，利用自身善于筹算的商业头脑，为清军营建出多台站分站传递式后勤补运通道，大幅减少运输成本，提高补运效率。到雍正、乾隆朝，除了军粮这个最重要的军需项目之外，被服靴帽、麻袋帐篷、驮畜、火药弹丸、铁条马掌、医药绷带、火漆朱砂皮胶蜡烛、牵星板、千里镜（望远镜），乃至烟酒糖茶、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凡前线清军所需繁杂物资，几乎全都由晋商分门别类承办了。

为提高效率和节流，晋商干脆就在处于清军集结路线的张家口、内蒙古归化城（呼和浩特）、包头、晋北大同等地开办专门针对军需服务的商号、作坊、匠铺、药店和畜场驼房，在当地进行生产加工，炒麸炒米，开炉打铁，蓄毡垫

织麻袋缝帐篷，硝生皮，烹枪药，把南方运来的散货生鲜药材，炮制成各种丸散膏丹；哪怕是不能生产的，也能由山西商号先接单立个折子，再派干练的伙计到内地采办。这些军需物资加工完成，再由专门经营驮畜场子的晋商打包，组织驼队运往前方清军驻地。产购销一条龙，外加托运包邮，俨然是成为全方位服务的军事承包商。清军除了火炮鸟枪等火器之外，把其他军需物资都交给商人承办，晋商已然成为支撑清军作战的后勤保障力量。他们甚至还可以提供一些基本的金融服务，当时数万清军的饷银和蒙古王公、活佛们的年俸是清政府一笔很大的财政负担，驻扎在蒙古的清朝军政机构也有各项公务开支，但是从清朝户部拨出银子到这些银子落实到位之间有个时间差，就先由晋商出资垫支。

军事承包商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过，但以晋商对清军的军需服务水准最高，服务态度最好。就拿运粮来说，在1696年至1697年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时，清军自己组织运粮，以每个野战士兵配给一名以上厮役和四头驮马的比例保证军粮供应，结果却并不让人满意；时隔近六十年之后的乾隆二十年（1755年），北路清军的军粮供应全部交给内务府山西籍投充买卖人赵实泰组织的粮队，顺利抵达伊犁。在赵实泰的这支粮队里，有个“拉骆驼”的段姓山西大伙计，此人就是后来三大对蒙贸易商号之一的元盛德东家段大维。

到晚清同治、光绪时期，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和收复新疆，一些徽商和津商效仿晋商，为西征清军提供类似的后勤保障工作。

五、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彻底攻灭准噶尔，

将新疆收入版图，长达七十年的清准战争终于结束。此时的晋商通过长期给清军提供军需服务，也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物资运输模式，他们就把在战争中学来的物资传递手段使用到对外蒙古、新疆、哈萨克和俄罗斯的长途贸易贩运业务当中。从北宋时期开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大分裂形势导致中原政权失去对西北控制等原因，古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然而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清准战争结束后，晋商却经营着从中原进出中亚腹地最高效的陆路行动路线，让丝绸之路的商道获得部分重生。

清朝中后期，大盛魁、天义德等数家从事对蒙、对俄贸易的山西商号已经形成气候，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通过为清军提供军需服务，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

六、清朝不仅有随军晋商，还有专门为军队提供汇兑储蓄业务的随军账局、票号。很多清朝影视剧中，都有反映军营里发饷分银子的内容，经常出现大数额的现银流通，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成千上万的士兵，他们的军饷如果都拨发现银，由个人随身保存，既不方便更不安全，还会惹出是非，滋长军营里的赌博风气，因此军官都鼓励士兵把饷银存入随军票号，称为“存饷”。随军票号的服务对象不只限于军队，像驼队把式、铁匠等经常和军队有来往的人员，也有资格往里面存钱。这种军营里的金融服务，在清朝初年还是由兵部衙门或八旗衙门督办，由基层军营的兵备处具体经办的账局提供，在雍正、乾隆朝时期的八旗军和北方的绿营中，逐渐变为由晋商承办的私营随军票号提供。为了限制军营里现银流通，煞灭赌博习气，清军甚至强制规定，士兵月

饷的半数必须强制扣发，直接存入票号。

就以绿营兵为例：一名入伍过训的士兵会得到一张执照，相当于士兵证，同时还要办理一式三份的存款执票，由军方、票号和士兵家属分别保存。这样一来，即便这个士兵在异地驻守或执行作战任务，他的家属也能及时领取饷银。执照上面还印有“优待军属”、“光耀门庭”之类的文字，凭此证明是军人之家，得到地方政府和乡绅的照顾，获得减免部分差役税赋等形式的优待。今天我们一提到清代票号，介绍较多的都是诸如晚清道光年间“日升昌”等主要从事内地商业汇兑业务的字号，却很少有人知道清朝还有随军票号，以及由随军票号发展而来、针对外蒙古各盟旗的王公、活佛、主要从事“放印票”生意的山西旅蒙商票号。

七、就以本书开头讲述的这件事来说，在清军未入关前，部分身为大明子民的晋商就与关外的清军做生意，若是处在汉族主义至上的视角，堪称见利忘义的汉奸行径。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作用的，政治斗争的得失也总是和经济利益的争夺相关。中国还有很浓厚的官本位意识，商人要想发达，必定攀附官僚；反过来，具备雄厚财力的富贾巨商也热衷从事政治投资。晋商、徽商通过捐纳给自己买个红顶子的行为，就属这种心态作祟。“官商勾结”被赋予很浓重的贬义色彩，却是社会上最普遍的现象。官商勾结不是晋商发明的，更不是到明清两代才出现的，但是在这个时期，商人集团与政治集团取得了最深刻、最广泛的结合。

攻灭准噶尔，标志清朝国力达到鼎盛。此时的晋商也开始出现若干家资财雄厚的超级商号，在一些行业里呈垄断之



势。1911年清朝灭亡，这些已经有两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在苦苦支持十余年后，陆续在二三十年代关张歇业。晋商商号和清朝的国运如影相随，达到节奏高度一致的休戚与共，显然有很深刻的因果联系。

八、在中国地理科学发展史上，随着经历数千年的开发和人口增值到亿万数量级规模，到明朝，中原内地已经基本没有不为人知的荒蛮僻域。明朝前期，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最知名的大型地理探索活动，即郑和下西洋和亦失哈经略奴儿干都司。明朝中后期，渐有徐霞客、李时珍等目的不同的民间游侠。然而相对鲜有人知的是，在同一时期对大江南北从事地理探索最持久、最热衷开辟新路径的群体，却是商人。徐霞客游历天下，为的是志在四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时珍是为了修撰药典，福泽黎庶；而商人这么做的动机，是为了逃税。

在明清两朝，关税是位居田赋、盐税之后的第三大税收。除了官府在关榷要道设卡抽税，沿途各方豪强势力也会伸出手来吃拿卡要。雁过拔毛层层扒皮，这是商人从事长途贩运过程中担负的最大成本，行商为避免遭受盘剥，采取的对策就是自行开辟新路、精心筹划行程。官府对商人这种行为自然是深恶痛绝，斥为“奸商绕越”，在北方就数晋商最精通此道。别看晋商极力攀附统治者，但无商不奸，只要逮着机会照样耍小聪明。某家行商开辟出一条新路，通过在同业商行或同乡会馆的社交活动，与关系熟络的其他商人共享，大家还要共同起誓，不得外传泄密。官府虽然有可能获取一些信息，但拖沓迟冗的官僚作风使他们不能即时采取封